

1979年

報告文學選

命 运	1
正气歌	88
好孩子	120
船 长	139
大雁情	165
她有多少孩子	190
这里有十万颗火热的心	210
在高高的横杆前	231
晶	244
之间	261

叩 运

杨匡满 郭宝臣

一 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

这是北京城内北海西岸旁边的一座并不引人注目的灰色楼房。一九七五年的秋天，悄悄地然而过早地来到它的身边。里面住着谁？谁是它的主人？那时只有极少的人知道。

九月七日中午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它的门前。来访者是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、罗共中央书记维尔德茨。他是前来看望周恩来总理的，也是周总理一生中会见的难以数计的外国朋友中最后的一个。

原来，周总理自病重以后，一直移居在这里。这儿的临时作了他的医院，又是他工作和会客的地方。

会见的时间不长，因为总理的健康状况已不许可他长时间接待客人。他的清癯的脸上，老年斑已越来越明显。他的体重，已由几年前的一百三十斤下降到八、九十斤。似乎还是在昨天，总理还是个永不疲倦的人，今天，谁能想到，他连散步四分钟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仅仅是一个月前，他还能去北海的柳荫下走一走，到仿膳斋坐一坐。现在，他需要更多的休息，人民希望他更多地休息。全中国九亿人口当中，无疑，他是最有权利、最需要休息的人呵！

可是，为了革命从来是奋不顾身的周总理，打破了原先安排的只是合影留念和简单交谈几句的接待计划，仍然请罗马尼亚同志到会客室坐。

“马克思的请帖，我已经收到了。”这是周总理的第一句话。在座的人一阵心酸，但总理的神色是那么坦然。

接着，总理从齐奥塞斯库起，一个一个问候了罗马尼亚的老朋友。他说：

“请你告诉齐奥塞斯库同志，经过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，是有许多有才干、有能力的领导人的。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，是敢于斗争的。”

他还说到：“现在，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。”

在旁陪同的负责同志插话说：“这是指邓小平同志。”

维尔德茨同志刚走，趁着总理还没有离开会客室走向他的卧室，趁着摄影记者还在，一部分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：警卫、炊事员和医生，要求和总理一起照像。尽管大家不忍心多占他一分一秒的时间，可大家心里都明白，这样的机会，至少是不多了，很可能是最后一次。在照相结束的时候，总理说了一句话：“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。”

总理的声音依然是十分平静的。但工作人员们听了都十分震惊。他说这样的话，含意是什么呢？他是从来不谈自己的，不论在怎样险恶的境遇里，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，也不论在怎样剧烈的病痛中，特别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。

几天之后，总理要进行一次大的手术。手术之前，政治局的一些成员，包括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，去看望他。他们挨个儿走到总理床前，同总理握手。王洪文刚从上海回来不久，夏季的风刮得他惊魂未定，但他仍然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；张春桥则蜗居了多时，阴沉的脸上隐藏着让人看不见的冷笑。来到总理面前时，这两个人都做出很虔诚的样子。总理犀利的目光盯在他们脸上，缓缓地说：“你们要好好帮助小平同志工作。”

十月，总理又要进行一次大手术。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又来看望他，有邓小平、叶剑英、汪东兴，还有王洪文、张春桥……总理躺在手术车上，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医生轻轻推着车，经过走廊。邓小平同志靠近手术车，总理握住了小平同志伸过来的手说：“你这一年干得很好，比我强得多……”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很清晰，推车的医生，一旁的张春桥，都听得十分真切。或许小平同志的耳朵有点背，没有听清这句话，转过脸问别人：“总理说的什么？”张春桥象通常那样绷着脸，淡淡地应道：“他说，要我们好好帮助你工作。”

十月的这次手术之后，周总理再也没有能够起来。为了让总理安静地休息，除了邓大姐几乎天天来看望，陪坐在总理身边之外，没有什么客人来。十月，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急剧转折的一个月。七、八、九三个月，在人民中间兴奋地传播着的事情，一概被说成了“政治谣言”。“批《水浒》”似乎在升级。迟群又是电报、又是长途电话追到昔阳，急催“梁效”的一班人马火速赶回北京。迟群向他们大发雷霆：“阶级斗争那么紧张，你们还游山玩水？”十一月底，提前广播了《红旗》第十二期上梁效的《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》一文。它象一盆冷水突然浇到人们头上，才舒展了几个月的眉头重又凝结起来。风向要转了，又要反“右”了。明眼人一下子看出来，梁效的炮口所向决不是一个周荣鑫，更不是清华的刘冰，它是在瞄准邓小平，瞄准周总理。

周总理静静地躺在病榻上。窗外发生的一切，他是知道的。对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说，对斗争经历如此丰富的革命家周总理来说，窗外传来的每一个新的口号，每一个新的用词，都逃不过他的耳朵。十月之前，总理支撑着，还可以自己看报。十月中旬之后，他只能依靠医务人员读报了。开

始，他有时还说一声“停”，让换一篇文章读，后来，连说一个“停”字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医务人员慢慢只给总理读一些标题。总理一向是严守纪律的模范，该在什么范围讲的，决不在范围之外讲，包括对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。听了读报，总理能作什么表示呢？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，望着天花板，叹着气，摇着头。显然，总理的心里是明白的。当时王张江姚一伙，对总理严加封锁；邓小平副总理以及总理的其他一些老战友们，正面临着越来越猖狂的诬陷和攻击，不忍心让总理再为他们分担忧虑；至于在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，自然更不能把外边听来的情况告诉他。

十二月六日，医生为总理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，想竭尽全力延长他宝贵的生命。中旬以后，总理已不能进食，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。癌细胞已经扩散，剧痛常常使得他晕过去。为了减轻他的痛苦，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。总理醒来时，依然时时叹气。床边，只有邓大姐静静地坐着。此时，这一对半个多世纪患难与共的战友与夫妻，已经相对无言，因为总理已经不能说话了。叶剑英同志早晚两个电话打到医院里来，询问总理的病情：吃的怎样？睡的怎样？有没有大便？……即使叶帅到海南岛期间，仍然一天两个电话打到这北海岸边来。

一九七六年的元旦在一种沉郁的气氛中来临。《人民日报》冠冕堂皇地用毛主席的两句诗作为社论的题目：《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》。但登攀什么？“蓬间雀”指的又是谁？人们关在家里，亲人之间，知心朋友之间，喝着闷酒，提着疑问：

“选一部分中学生直接上大学，是总理在主席面前提的，这怎么也批了？”

“陆定一当年是拿了家里的钱资助革命，这怎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了？照此逻辑，恩格斯办过商业事务所，从那里不断寄钱支援马克思，那恩格斯也是阶级异己分子了？！”

……

稍有良心的人们，从正面、反面，或则单刀直入，或则旁敲侧击，谈着历史，说着怪话，发着老骚。好在这一个元旦的供应倒还可以，有东西可吃。笔者见过的南京市的一个业余文艺作者，那时正举行婚礼。他采购了显然是过量的糖果点心，大声地招呼着他的客人们：“大家快吃吧！要是邓小平下台了，就没有吃了！”

总不完全是乌云遮天吧？总还有一线阳光吧？人们这样祈望着。总理的病经过治疗，总会好的，全国有的是名医。有朝一日，总理又会见报，他会给我们说话的……

同人们的希望相反，无可挽回的事实给了一个民族劈头盖脑的一击。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七分，昼夜不停的心电图示波器上的波纹，变成了一条水平线，一颗为人民劳累了七十八年的伟大的心脏永远休息了。

政治局的成员们赶来了。邓小平默默地肃立在总理的床前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江青进来，看都不看总理一眼，在病房里转了一圈，尖着嗓子喊：“小超呢？”“小超”是周总理对邓颖超同志的称呼。医务人员听到江青的叫唤，心中暗骂：“你有什么资格喊小超？”

最初的哀乐和讣告，是九日零时广播的。中国大多数的人，从天亮时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这一噩耗。人们的第一个感觉，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总理那种过人的精力，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姿态，不就在眼前吗！新华社搞错了吧？不少人打电话去问。工人、干部、售货员、学生……照例冒着零下

十度的寒冷，挤上公共汽车去上班、上学。车上，往日常有的嘈杂声忽然消失了，仿佛一夜之间，人们的道德水准、文明水准都提高了。相识不相识，都默默地相让着。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和哀乐，不停地传到车里来，捶击着人们的心。看来，消息是真的了！渐渐地，大滴大滴的泪，从老年人、中年人、青年人的眼眶里涌出来，妇女们抽泣着。

整个中国在哀乐中震颤！整个世界在哀乐中震颤！

总理的遗体，被移至北京医院后院一间普通的停尸房里。大约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房子，前面没有过道，一扇门直通户外。总理遗体停放在房子中间，四周放着塑料盆花。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。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，所剩下的空间就只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。门外可以用来停车的空地，不过两个篮球场那么大，一条窄窄的柏油路，从这里绕到东单公园西侧的马路。

向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数，由原定的六万减至四万。

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的天数，由三天减至两天。

北京医院的围墙外，从东单到东交民巷，从凌晨到深夜，聚满了人群。哭声和要求最后见一见总理的喊声传到院内来。北京医院整个住院部的窗帘都不许打开，说是不让病员受这样的刺激。有的重病人因过度伤感突然病情恶化了。

一月九日起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花圈。花圈越来越多，几天之后，碑座上已经拥挤不下，放到了广场上。南边的松墙上，缀满了朵朵小白花。成千成万的人，无论是集体前来，或是独自前来，都面对纪念碑脱帽默哀，宣誓之声，哀恸之音，彻夜不绝。

隆冬的气流冷得象已经冻结。在这冻结的气流之中，渐渐响起了国际悲歌。无数粗大的嗓子、稚嫩的嗓子、喑哑的

嗓子、嘹亮的嗓子在唱着，此伏彼起，一片接一片。

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，

起来，全世界受苦的人。

.....

不相识的人，自动加入了集体的合唱。不相识的人，在这严寒笼罩的广场上，可以凭着国际歌声找到无数的知音。

一月十一日下午，天空象人们的心情一样阴沉得不见一丝阳光。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，首都百万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，扶老携幼，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总理。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没有人动员、没有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队伍。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隆重、如此悲壮的葬礼。当晚，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附近公社的社员，蜂拥到火化处，不让火化总理的遗体，争执持续到深夜。最后只好由邓大姐出面做工作。无数的电报和书信寄到中央，要求保存总理的遗体。人民对周总理感情之深，任何言辞都无法表达。更何况我们建国以来，就一个总理呵！

从一月九日到一月十五日这一周，大概是有史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最悲痛，也是最难熬的一周。听一遍哀乐掉一次泪，听一遍《国际歌》掉一次泪。

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。追悼会不让开，灵堂不让设，黑纱不让戴，怀念总理的诗文不准发表。竟然还传达下来这样的“精神”，大意是：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；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……

广大的党员、干部和群众，并不理会这些禁令。在北京，除了“两校”，几乎所有的单位都设了灵堂，戴了黑纱。

至于人们的嘴，那更是封不住的。人们议论着电视屏幕

上王张江姚的表演，挖苦着，嘲笑着，怒骂着，抗议着。

人们拿起一月十四日那张载有所谓《大辩论带来大变化》的报纸，抗议着。撕扯着，把撕碎的报纸寄还给《人民日报》。《人民日报》一天之中收到了不下三百个抗议电话。

“你是哪个单位的？”接电话的人想记下一点线索。

“我是你爷爷！”抗议的人不傻，“啪”一声挂断了。

自然，人们更关心的是，谁致悼词？谁当总理？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，关系到每家每户的老人孩子和柴米油盐。然而，议论也好，猜测也好，都不过只是心里的自由罢了。不仅如此，连这种心里的自由也正受着干预和威胁。

当时，人们最感忧虑的，是千万不要让张春桥当总理。这个老是阴着脸的“第二副总理”，在人们心目中是个心毒手辣的家伙。江青已经臭了，料她也争不上；王洪文和姚文元都乳臭未干。对于邓小平，人们抱有极大的好感和同情。但电台报纸天天在批。不用说，连周总理都在蒙冤受屈，邓小平还保得住吗？

人们在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一月十五日这一天。希望它到来，似乎更怕它到来。

二 一月十五日

一月十五日，北京是一个晴朗的日子。但温度低到零下十度，还刮着三四级北风。

七机部五〇二所的一支二、三百人的队伍，包括当时还戴着“特务”帽子的六十多岁的老所长和青年科研人员瞿海良等，一清早，就有的骑自行车，有的乘公共汽车，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外边的街上。许多人没有来得及吃早点，只带了点干粮。几天前，也就是一月九日，他们来到天安门

广场献了花圈。今天，他们又来了，集合了更多的人。他们准备在这里等上整整一天，只希望看一看总理的灵车。

他们不久前才从我国大西北的一个卫星发射场赶回来。他们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九日，为祖国第一次回收卫星成功！当天，叶帅打了长途电话到基地表示祝贺。但是，没有总理的电话。人们多么想把这个消息直接报告病中的总理呵！如今，他们只希望看一看载有总理骨灰的灵车。

大家事先估计到，追悼会既然下午三时开，大约会在中午十二时戒严。所以，他们要远远赶在戒严之前到天安门。果然是人同此心，广场上至少已有几万人等候在那里了。

十点刚过，广场上出现了人数众多的警察和民兵。从纪念碑起，要把人群往北压。这是要“清场”了。人们看到，一个穿军大衣的五十来岁的高个子，嘶哑着嗓子指挥着警察和民兵：“动员他们走，快！两个架一个，把人动员走……”人群被驱赶着，象波浪一样，一会儿进一会儿退。

开始了辩论，开始了抗争。瞿海良的一个同事说：“为什么要赶我们走，悼念总理，你们是什么心情？”

一个民兵答道：“和你们心情一样，让你走你就走。”

“不一样！我们戴黑纱，你戴的可是红袖章。”

在警察和民兵之中，有的人噙着泪劝说人们离开，有的却粗暴地推搡着，好象人群的辩论和抗争，太无法无天了。

几万人的人流，渐渐被压到长安街北边红墙根下的白杨树林之中。不同单位的人，不相识的人，男同志，女同志，不分你我，互相照应着、鼓励着，互相探询着：“他们会抓人吗？他们敢抓人吗？”

抗议在继续，争执在继续，冲突在继续。

从天津赶来的刚下夜班的两个工人哭喊着：“我们为悼

念总理才赶来北京，你们为什么撵我们？”

三个哭喊着要见周总理的女孩子，被架走了。

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，象发了疯似的非要冲过去不可。他的眼睛里冒着火，简直是要拼了。几个民兵开始向他围来。五〇二所的几个同志不约而同地上去，拽开那几个民兵，把这个过于激动的青年抢了过来，拉进自己的队伍里。人们含着眼泪劝他：“他们是不让我们说理的！”只是这句话，使这个青年清醒过来。他扶住一个女同志的肩头，嚎啕大哭。

有一部分人，被压挤到厕所里，不准出来。更多的人则无法上厕所。第二十八中学就在附近，可以去二十八中上厕所，可是人群被严密地围困住，不准动。

三点到了！越来越激烈的争辩的嘈杂声一下子突然消失了！整个广场上静得连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。好象一个无声的具有神奇力量的命令，使一切声音戛然而止。

红旗牌轿车，一辆接一辆地停在人民大会堂门口，却不见灵车的到来。人们踮着脚尖，睁大泪眼，望着、等待着。累了，就在冰冷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一会儿；饿了，就啃一点干馒头。老所长默默地把自己买的糕点分给大家。树林子里，不管相识不相识，馒头、点心大家匀着吃，水分着喝。就这样，一直等到天黑，等到晚八点。终于，警察走了，民兵散了，人们可以走向广场，走向纪念碑了。广场是黑暗的，没有一盏灯。但总算是自由了，眼泪要流就让它尽情地流吧！想放声大哭就尽情地哭吧！

因为戒严而沉寂了一个白天，重又响起了国际悲歌。

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

要为真理而斗争！

.....

就在一月十五日的这一天，上海九时五十七分，也就是周总理一月八日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个时刻，上海港许许多多大小船舶先后自发地拉响汽笛，向总理致哀。悲愤的汽笛声持续了三十七分钟。外滩，这个平时热闹非凡的地方，此时仿佛冷冻了一般。从来车辆人流如梭的马路，顿时凝固了：红灯止车，警察和行人严立。空前庄严肃穆的气氛统治了一切。中午一时左右，又有一批船只拉响汽笛。下午三时正，在北京举行周总理追悼大会的时刻，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上，又汽笛轰鸣。江上停泊的，或正在行驶的船只和几乎所有的

外轮同时鸣笛致哀。

率先拉响汽笛的“友谊号”游艇，当年周总理曾经乘坐它视察过黄浦江。全体船员在笛声中列队甲板，面朝北方。

在“沪监引二号”轮的航海日志上，工工整整地记载着：“上午十时，拉回声二十分钟，向周总理致哀。”

在海运局的供水二号船上，船员们干脆把拉笛的拴绳拴在舵轮上，汽笛直对着上海市委大楼长鸣三十多分钟。

盘踞上海的马天水之流，被这一片汽笛声吓坏了。上海港务局、上海海运局离市委大楼不过一箭之地。刚过十时，追查鸣笛事件的电话，接二连三地从市委工交组、外事办公室和公安局打来。马天水亲自出马，给航运局连打三个电话，气势汹汹地嚎叫：“你们拉汽笛违反上级规定”，“影响了水上治安……”，还派出联络员，指令要严加追查。

几乎是与鸣笛同时，工人、居民、学生、机关干部，一队一队簇拥着花圈，从各个路口向外滩马路上涌来，又涌向市革委大楼。不知是哪个人的命令，说革委会大楼不准进花圈。紧闭的大门象一道大闸，想挡住这花圈的洪流。可是，人越来越多，无法阻挡。又不知是谁下了命令，让出一间地

下室来。群众说：这叫什么？一不设灵堂，二不放哀乐，等于是个存放花圈的仓库。

紧挨着市革委大楼的上海港务监督和长航职工医院里，一批机关干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他们把高音喇叭对准市革委，把唱机安装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会议室里，门反锁，门里又堵上乒乓球桌。于是，摧人肝肠的哀乐，应和着千艇万轮的汽笛，在黄浦江边交响。送花圈的群众听到这哀乐，都不约而同地仰望这座大楼，向它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
接连不断的哀乐声又照例吓坏了马天水之流。马天水立即抓起笔来，在纸上写下命令，让“文攻武卫”们捏在手里去追查放哀乐的人。“停下！停下！”他们在这座楼里上下吼叫，不仅没有能制止，喇叭的音量反而调得更大了。后来，小会议室终于被发现了，“文攻武卫”们拿出马天水的手令，但这手令变成了一张废纸，遭到干部们的严厉拒绝。他们找到一个团支部书记，要她做团员的工作，她的回答是：“我做不了！”他们又缠住一个共产党员不放，要他出面干预，不然要动一动他的党籍，这位党员同样严辞反驳：“悼念总理如果有罪，我愿意坐牢！”

黄浦江边的哀乐，一直播放到深夜。汽笛和哀乐，倾吐了人们心中的哀伤和不平，但人们的哀伤太深了，不平太大了！一系列的追查不但没有把人们吓退，相反，人们在时刻寻找着新的形式和新的机会进行斗争。

是夜，周总理的骨灰曾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短暂停留。十六日的凌晨，北京空军某部的一处机场，一架夜航机奉命升空。没有仪式，飞行员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紧急任务。总理的骨灰就这样撒了。飞机仅仅来回飞了一个多小时。

可是，一个小道消息在悄悄传开。人们传说有人在凌晨

三时左右，看到邓小平同志来过天安门广场，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默立，并且同周围的人交谈……

三 《文汇报》成了导火线

邓小平同志致悼词，人们悬着的心落下了一些。他严肃的面容，有力的音调，打动着每一个人，很少有人不落泪的。可是没有几天，人们的心又更高地悬了起来，因为王张江姚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在直线上升。

二月二日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，华国锋同志担任代总理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。当时，一般人对华国锋同志了解得还不多，但人们知道，华国锋同志是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主要参与人，是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主报告人，是上海秘密散发的材料里攻击的对象之一。单凭这些，人们就有好感了。他担任代总理，无疑对张春桥是个严重打击，对张春桥等人的篡权，是一个新的障碍。二月三日，张春桥咬恨吞仇，写下“有感”，叫嚣要“新桃换旧符”，准备进行更阴险的篡权活动。

在此之前，上海的街头曾经出现过“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”的大标语。张春桥对此不免有些愠怒。因为这过早地泄露了他的隐私，无异于是给他帮倒忙。张春桥当即下令：马上刷掉！尽管这样，民间的口头文学家们还是不放过这个素材，他们把标语中几个字的位置变更了一下，这就成了“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”。

局势违逆着人们的愿望，急剧地往下发展。

继二月一日出版的《红旗》第二期抛出了两校大批判组的第二发重炮《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》之后，二月十二日，《北京日报》刊登了梁效的文章，率先提出所谓“不肯

改悔的最大走资派”问题。二月六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》的记者述评，提出所谓“右倾翻案风的风源”问题，并点出“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”。三月一日出版的《红旗》第三期，抛出署名池恒的《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》的文章。王张江姚篡党夺权的纲领公开亮出了。报纸、电台还连篇累牍地制造舆论，要求所有干部群众“转弯子”，同他们一起“批邓”。

邓小平当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主要敌手，但打倒一个邓小平，毕竟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。而要彻底打倒邓小平以及在世的老一辈革命家，就要砍倒周总理这棵大树。十年来，这棵大树庇护了多少老将老师，成了王张江姚这些野心家们不可逾越的障碍。如今，总理去世了，但他的树荫还在。他的精神，他的政治品格，仍在给老一辈革命家和全国人民以鼓舞和力量。从一月的哀思中表现出来的人民的力量，使王张江姚心寒胆怯。他们准备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进行鞭尸。

早在周总理逝世前后的几天之内，王张江姚在上海执掌宣传大权的余党，就在为报纸删改稿件时作了“示范”：

“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”，删掉；

“以周总理为榜样”，删掉；

“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”，删掉。张春桥说：

“三次武装起义剩下的好人不多了。”

报社送了几份悼念周总理的文章，批示是：“不发！”

下面是三月五日《文汇报》发表三月四日新华社播发的《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》一稿时的删改：

……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，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工作，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，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，公而忘私的共

产主义风格，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，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，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……

文中的黑体字是被《文汇报》删去的，其中“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，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，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，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”，是周总理的题词。

再看三月二十五日《文汇报》题为《走资派还在走，我们就要同他斗》的通讯，其中借用了某局副书记的话，曰：

“……他效法孔老二‘克己复礼’，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：孔老二鼓吹‘仁政’，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，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；孔老二要‘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’，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。……”

“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”，当时已家喻户晓，是加在邓小平同志头上的专用名词，那么，扶他上台的“党内那个走资派”是谁呢？这段干瘪枯燥的文字，没有滑过读者的眼睛。“批林批孔”以来，骂孔丘、骂大儒、骂宰相的文字连篇累牍，连普遍的工人、农民，都知道它们的矛头所向。

谢谢《文汇报》，给人民提供了这样一个突破口，人民在保卫周总理的旗帜下，可以挺身出来说话了！

成百上千封抗议、责问、声讨的信件、电报飞向《文汇报》社，抗议的短途长途电话，从清早到深夜，打到《文汇报》社。群众强烈要求《文汇报》的后台站出来，作出交待。有的信中，还公开点了张春桥的名。

“四人帮”在《文汇报》的爪牙惶惶不可终日，专门成立了一个组来对付群众的愤怒。老奸巨滑的马天水也不得不亲自出马，与同伙拟定了一个不成文的文件，逐字逐句往下灌，以此来稳定上海的阵脚。

现在有人利用《文汇报》“三·五”“三·二五”报道大作文章，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，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政治事件。我们不要受他们的干扰，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，继续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。……

尽管他们玩弄各种花招，但这只不过是用水扑火，火上浇油。人民群众愤怒的火焰，正以更迅猛的气势蔓延开来。

在全国，几乎到处都在冒烟。每个城市每个乡村、以及每一个家庭，时时在迸发出愤怒的火星。就连“四人帮”散发的大量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，也起到了与散发者愿望相反的作用。七机部的一位同志说：“不看不知道，原来邓小平、胡耀邦、周荣鑫他们有那么多好主张。”这真是极妙之言。使“四人帮”更为恼火的是，一九七五年夏季的那些“政治谣言”、“政治笑话”有增无已，越禁越多。幽默似乎不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，但此时中国人民的幽默达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。这是肆无忌惮的高压和英勇无畏的反抗相互冲击的火花。笔者特抄录一则“政治笑话”以飨读者：

王洪文跃升副主席，想讨好一下朱老总。碰到朱老总，他就直呼其名。朱老总不理他，举起拐棍，指指天，又指指地，转身就走了。

王洪文不解其意，就去问邓小平。邓小平说：“那还不明白，这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。”

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王洪文第二次去了。朱老总说：“你接班，可以。只要你把这个鸡蛋给我立起来。”

王洪文回去之后，冥思苦想了几天，又同小兄弟们横竖摆弄了几天，结果，一个个都瞠目结舌。

没辙，他只好又去找邓小平。邓小平说：“这还不